

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

主编 徐家良

中国第三部门研究

CHINA THIRD SECTOR RESEARCH

第三卷

- 公益行动与政策改变 / 马 骅 朱健刚
- 政府采购法制与非营利组织：台湾经验 / 江明修 李衍儒
- 第三部门资源困境与三圈互动：以秦巴山区七个组织为例 / 徐家良
- 公益服务组织与基金会的不对称合作及其矫正：基于秦巴山区两个机构访谈资料的分析 / 赵 挺
- 产权的社会支持——以C市政策性农业担保公司为例 / 王 维
- 民办高校举办者变更与控制权私利 / 周红卫 王彦玮

CTSR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

中国第三部门研究

CHINA THIRD SECTOR RESEARCH

第三卷

徐家良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卷为第三部门研究的专题文集,收录主题论文6篇,书评1篇,访谈录2篇,域外见闻1篇。本书研究公益行动与政策改变、政府采购法制与非营利组织的台湾经验、第三部门资源困境与三圈互动、产权的社会支持、民办高校举办者变更与控制权私利等;书评部分对《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一书进行评论;访谈录记录了第三部门实务人员的公益之路与残疾人生存方式的革命;域外见闻综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中心的兴衰历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第三部门研究,第3卷/徐家良主编. —上海: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313-09056-0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社会团体—研究—中国
IV. ①C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2401 号

中国第三部门研究 第三卷

徐家良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常熟市梅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0.75 字数:157千字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13-09056-0/C 定价: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661481

主编的话

2012年上半年,与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密切有关系的,主要有六件事值得一写:

第一件事:关注社会组织资源困境状态。2月3日,春节刚过,我应邀参加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召开的“突破草根资源困境”座谈会。南都公益基金会非常重视这次会议,秘书长刘鸿洲主持,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副理事长程玉与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学者和相关公益界人士参加,讨论的问题很多,最后聚焦到两个方面:一是草根组织是不是缺少运行的必需资源;二是如果缺少资源,缺哪些资源,对政府和公益支持组织来说,采取哪一种方式来解决面临的问题。这次会议召开的由来是2011年12月28日,以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为代表的秦巴山区7个乡村公益发展组织向基金会中心网发出“NGO生存状况的情况报告与联合呼吁”,诉求资源困境的难处和无奈。我在会议发言以后,与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秘书长高向军联系,准备实地去了解情况,5月15日,和博士生赵挺一起到四川仪陇调研秦巴山区社会组织情况,访谈5个机构的负责人,从中获取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了解社会组织发展活力特点和所遇困境。本卷中有两篇论文就是这次调研的成果。

第二件事:筹划召开两岸四地中国非营利组织研究机构负责人会议。3月9日、3月31日,应邀分别到香港和台湾参加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召开的大中华圈第三部门与公共治理国际研讨会、台湾政治大学举办的公民社会学术研讨会,作了题为“中国大陆公民参与的现状与前景”、“中国大陆第三部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学术报告。这是我第三次去香港和台湾,会见学术界的老朋友和认识新朋友感到非常亲切,尤其是研究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的学者越来越多,令人高兴!在这两次会议的饭后茶余的漫谈中,准备筹划两岸四地中国非营利组

织研究机构负责人会议,介绍机构教育和研究中的情况,谋求合作发展的空间,第一次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 2012 年金秋十月在上海承办。

第三件事:社会组织职业可望进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2011 年 10 月,承担上海市民政局行业协会国家职业标准课题后,一直在思考行业协会国家职业标准应该是什么。到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了解到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牵头修改 1999 年制定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时,马上与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相关领导联系,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专门邀请专家学者召开会议,探讨社会组织职业进入职业大典的可行性,经过比较,发现社会组织工作师、会员管理师、劝募师更具操作性。尽管社会组织职业进入“职业大典”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毕竟开了一个好头,为新的职业产生做一点事,甚感欣慰。

第四件事:对社会组织进行公益招投标孵化。受北京市温暖基金会委托,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公益招投标。4 月 8 日,“职工服务公益孵化”进行评审,在 18 个项目中评出 9 个公益项目进行孵化,这是目前不是由政府主导而是由研究机构第三方进行的公益孵化,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第五件事:社会组织促进会成立专家委员会。4 月 20 日,应邀参加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委员,在大会发言中强调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专家委员会是学术共同体、信息沟通机构、智库机构,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

第六件事:带研究生去做田野调查和访谈。由于 2012 年上半年有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课程“非营利组织研究”、“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研究”,5 月 3 日,参观和访谈上海浦东公益服务园、基金会服务园和塘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作为“校外寻思”的重要组成部分,尽可能做到研究生培养的多元化——读第三部门的书、看第三部门所做的事、听第三部门所说的话、写第三部门的文章,训练第三部门职业化专业人才。

《中国第三部门研究》第三卷,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组稿的。

与第一卷、第二卷一样,本卷仍保持着以下几个栏目:主题论文、书评、访谈录和域外见闻。

主题论文。我们约邀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马骅、朱健刚以“公益行动与政策改变”为题,探讨公益行动影响政策的各种模式和特征,指出目前发现的这些案例依赖于政治机会条件,并不具有可复制性,但公益行动却能培育普通人的公民性,进而为公益行动制度化地参与政策过程提供持续的动力。台湾政治大学江明修教授、李衍儒博士生以“政府采购法制与非营利组织:台湾经验”为题,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理论、内涵以及台湾政府采购法制对非营利组织的规范及调查分析,归纳出相关发展历程与实践经验。我与博士生赵挺围绕“社会组织资源困境”写了两篇文章,我的文章“第三部门资源困境与三圈互动:以秦巴山区七个组织为例”,描述第三部门拥有的资源和希望得到的资源,第三部门圈在与政府圈、企业圈三圈互动中寻找显现的资源与潜在的资源,转变政府职能,加大政府的资源投入,增加资助型基金会第三部门的支持,确保第三部门可持续发展。博士生赵挺以“公益服务组织与基金会的不对称合作及其矫正:基于秦巴山区两个机构访谈资料的分析”为题,运用资源依赖理论“组织-环境”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基金会资助是这两个公益服务组织发展的重要影响变量,公益服务组织与基金会具有各自的优势,两者的合作关系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强依赖”与后者对前者的“弱依赖”的不对称性相互依赖,而公益市场的非竞争性是重要的解释机制。公益产业链作为一个概念正在形成中。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王维以“产权的社会支持——以C市政策性农业担保公司为例”为题,发现农民贷款难是制约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权缺少社会支持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产权是在行动者及其所处环境的互动中被逐渐建构出来的。采取何种策略取决于其自身的资源动员能力和面临的制度约束。王维关注的重点不是市场交易,而在于政府、金融机构和农民之间交易权利的安排。北京大学的周红卫、王彦玮以“民办高校举办者变更与控制权私利”为题对三所民办高校案例进行分析,认为举办者和创办者可

以通过民办高校举办者变更来获取控制权私利,部分举办者和创办者将投资教育作为一种短期的商业活动来运作,存在着比较强烈的营利动机及营利行为,而政府主管单位对民办高校控制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控制权私利行为没有进行有效的约束。

书评栏目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许源就朱健刚所著《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一书作了评论,认为朱健刚以人类学的扎实功底、民族志的写作手法,关注市民社会理论、权力关系、公共空间三个视角,对邻里公共空间的日常生活、互动场景、动力机制有细致、独特的观察与分析,然而,还是不可避免带着一些理论的视角或问题进入“现场”,叙述的方式有理论分割的痕迹。

访谈录栏目分别介绍公益领域的实践者商玉生和机构代表深圳市残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商玉生,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转变为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管理人员,由官办的社会组织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转向创办民间的社会组织 NPO 信息咨询中心,介绍了民间组织成立的曲折过程和第一代慈善公益人士的智慧灵感,为了规避民政部注册的困难,通过网络注册和工商注册,开展了不少活动。上海的恩派(NPI)和基金会中心网都与 NPO 信息咨询中心有密切的关联,关注行业自律和信息透明。访谈录特别提到“我已经七十几岁了,我感觉我最有意义的工作还是最近这些年在 NGO 当中的工作。以前有一篇文章称公益事业是‘崇高的事业、美好的前景’,我所接触到的这些机构、这些人和这些事,使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个社会需要这样一些机构,感觉到这样一种知识,能使社会有所发展。我记得德鲁克有句话‘非营利组织是一个改造人们灵魂的机构’。这句话我在 1990 年代读的时候不理解,我们做社团也好、做基金会也好,怎么能谈到是改造灵魂呢?”这些话令人感动。

深圳市残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雏型开始是在郑卫宁自己家中创建的,从 5 名残障人士、一台电脑的打字复印小作坊,逐渐演变成集 5 个组织法人于一体,形成企业、社会企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位、基金会组织多元化的残友集团。残友集团实施住宿、就餐、洗衣一体化免费服务的无障碍大后勤保障,实施从董事长、总经理直至中层干部均由残障人士担当的自我管理模式,实践在新知识经济时代,残障人士借助互联网,开创社会民生与高新产业互助发展的“和谐科技事业”,是中国社会企业的典型代表,既有特色,又有个性。

域外见闻栏目请爱德基金会研究主任谢颖介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中心,尽管这个中心已经停止活动,但它留下了许多值得人们回忆和总结的成果。公民社会中心的前身是“志愿组织中心”(Center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是英国历史上首家专为这一新生部门成立的研究机构,率先开展对志愿行动的研究与培训项目。公民社会中心成立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设志愿组织硕士课程、民间组织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把原有的硕士课程从“非政府组织管理”升级为“非政府组织与发展”。公民社会中心最初以英国为本,立足发展中地区和覆盖欧美,从初期关注志愿组织,到重视发展机构和公民社会全景。

感谢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徐永光、程玉、刘洲鸿的大力支持。2月16日、5月6日,徐永光和刘洲鸿在百忙中到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分别作了题为“慈善体制改革和社会创新”、“基金会内部治理”的演讲,与老师和同学交流慈善公益实践的最新发现。

在促进第三部门发展过程中,政府是一个圈,企业是一个圈,第三部门也是一个圈,如果仅仅是政府圈在动、企业圈在动,第三部门圈自身却不能自主地动起来,这样无法和谐,因为只有第三部门圈与政府圈、企业圈三圈互动,才能真正使第三部门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我们相信,《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将坚持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用数据和材料说话,尝试解释中国与境外共有的、特有的第三部门现象,努力不断创新第三部门理论。

徐家良

2012年6月1日

目 录

主题论文

- 002 公益行动与政策改变 马 骅 朱健刚
- 019 政府采购法制与非营利组织:台湾经验 江明修 李衍儒
- 034 第三部门资源困境与三圈互动:
以秦巴山区七个组织为例 徐家良
- 059 公益服务组织与基金会的不对称合作及其矫正:
基于秦巴山区两个机构访谈资料的分析 赵 挺
- 075 产权的社会支持
——以C市政策性农业担保公司为例 王 维
- 095 民办高校举办者变更与控制权私利 周红卫 王彦玮

书 评

- 110 邻里公共空间的形成:自然演进与被建构
——评《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
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 许 源

访谈录

- 120 一路向“草”——商玉生的公益之路 厉秉铎
- 133 残友模式:残疾人生活方式的革命
——访残友集团总经理刘海军 陈建刚

域外见闻

- 142 曾经慷慨犹在,更行更远还生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中心留影 谢 颖

001

中国第三部门研究

目 录

CONTENTS

Articles

- 018 Philanthropic Actions and Policy Changes Ma Hua
Zhu Jiangang
- 033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aiwan Experience Chiang Min-Hsiu
Lee Yen-Ju
- 057 Resource Dilemma of the Third Sector and Three Circles Interaction: a Case Study of Seven Nonprofits in Western Mainland China Xu Jialiang
- 073 The Unbalance Collaboration betwee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Foundation: Fieldwork Materials Analysis from Y and D in Western Mainland China Zhao Ting
- 094 Social Support for Property Rights: A Case Study of the C Agriculture Guaranty Company Wang Wei
- 108 Investors Change of Private College and Self-Benefit Control Zhou Hongwei
Wang Yanwei

Book Review

-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Neighborhood Space:
Natural Evolution and Constructed
— Review of *Between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An Ethnography of the Civil Associations and Community
Movements in a Shanghai Lilong Neighborhood* Xu Yuan

Interviews

- On the Grassroot Way
— the Philanthropic
Experience of Mr Shang Yusheng Li Bingduo
- CANYOU Model: the Revolution of the Handicap
Way of Living — An Interview with Liu Haijun,
the General Manager of CANYOU Chen Jiangang

Introduc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 Overseas

- The 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and Its Study a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Xie Ying

主题论文

ARTICLES

公益行动与政策改变

马 骅 朱健刚*

摘要: 21 世纪以来,普通人的公益行动正成为重要的政策改变的途径,尤其在 2011 年从邓飞的“免费午餐”项目到“拇指妹”成功拦下广州光亮工程,都体现出非政治的志愿性的公益行动能够被官民所共同接受,并对政府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一方面探讨公益行动影响政策的各种模式和特征;另一方面也指出目前发现的这些案例依赖于政治机会条件,并不具有可复制性。但即使这样,公益行动却能培育普通人的公民性,进而为公益行动制度化地参与政策过程提供持续的动力。

关键词: 公益行动;公共政策;公民参与;民生政治

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一直以来主要在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之间流转,普通人一般很难能够参与和影响。研究在威权体制下普通人参与政策制定的学者普遍认为,能够影响政策的个人必须是“超级公民”,他们具备理性、能言善道、有建设性等特征,同时他们充分了解关于政策的信息并寻求共识,而这些特征是一般的公民所不具备的(Leong, 2000:447)。

近年来,中国公益行动对政策的影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一类公益行动不同于集体维权行动(Li, 2010; O'Brien and Li, 1996),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负面抗议和对抗,而更注重的是建设性地尝试和公益性地参与;同时,他们也并不是专业性的利益集团所进行的政策游说行动,因而更多的体现为草根性志愿行动(朱健刚,2008),多由没有特权也没有特别资源的普通人引发。但正是这些普通人的

* 朱健刚,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Email:jiangang2010@gmail.com。马骅,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研究员,Email:bernice.ma.cop@gmail.com

公益行动,引发了事态结果的改变,或者是推动了政策的出台或转型。本文试图研究这一类志愿性的公益行动改变政策的过程,从两个方面对这个过程进行研究:一是考察公益行动本身具备的特征所形成的政策推力;二是思考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如何打开“窗口”,吸纳行动的诉求。本文将先讨论中国政策过程的特征以及对公民参与的影响,接着以邓飞“免费午餐”事件和广州“光亮工程”事件为例,分析公益行动的特征和作用,讨论公益行动如何能够进入政策周期,进而影响政策变化,并进一步讨论这种公益行动改变政策的路径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一、政策过程与公民参与

一般来说,政治系统并不孤立地存在,而是受到其周边环境的影响。这个环境既包括国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也包括国际环境。中国政治系统的政策制定过程总体来说比较封闭。朴贞子和金炯烈(2008:224)借用戴维·伊斯顿的“内输入”概念来描述中国的政策系统,指出内输入是指“在社会没有利益多元的条件下,由政府精英替代人民进行利益的综合与表达,其特征表现为权利精英之间的政治折中,而不是多元决策下的社会互动”。^①

在一个开放的过程中,政策制定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有公民的参与。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它却相对的封闭。其“内输入”特征,主要体现在政策议程建立、政策规划以及政策评估三个方面。

政策议程的建立:长期以来,政策议程的“创始者”主要是政治领袖以及权力精英的倡议,特别是那些关于长远性、根本性的政策,通常是由党的领袖创设。突发性事件或危机事件也常常能被推上议程。近年来,随着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兴起,一些大众关心的事情开始被有选择性的纳入政策议程,但总的来说,“顶层设计”还是政策议程设立的主旋律。

政策的规划:当一个问题受到重视而被放上政策议程后,就需要寻求解决的方案,这同时也是政策化的过程(胡伟,1998)。在中国,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与协商经常被省略,往往是政府各部门经过协商或妥协,然后出台相

^① 这个概念最初是由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1998:54)中提出的,主要用来描述“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角色的经验和活动所形成要求的”。

关政策。在某些时候,决策部门也可能会听取专家的意见,而普通市民基本没有与决策部门直接沟通的机会,他们经常不可避免地处于“被代表”的状态。

政策的评估:政策的评估其实是整个政策制定周期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关系政策的调整。不过,这一部分在中国政策过程中经常会被形式化的处理(陈世香、王笑含,2009:135)。正常的政策评估必须涉及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但在中国,政策的评估只是在政府内部完成的一份例行报告。除非出现严重后果,政策评估很难能够很好地执行。

从上述分析看来,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是相对封闭,难以进入的。因为做出决策的都是位于权力中心的高层官员,而其利益价值又高度一致,对于在非政治领域的普通公民来说,几乎不可能与决策部门形成对话,难以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

以广州“光亮工程”为例,2008年年底广州市建委制定出“光亮目标”,并表示至2008年7月底,珠江两岸将彻底消灭“黑点”,靠近珠江的所有楼盘,都会以不同方式闪闪发光。这项工程是在创文明、迎奥运、迎亚运等背景下出台的,在此之前并没有进行过市民听证等民意收集,也没有征询过人大的意见。这个项目还涉及珠江两岸住宅外观的问题,在面对质询,政府只是说“相关部门会进行协调”,但并没有更规范的法律程序给予支撑,而事实上这涉及物权问题,住宅的业主是可以选择不同意的。对此,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表示,他之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要搞“光亮工程”,如果政府有充足的理由,就应该去说服人大代表,而不是“拍拍脑袋”就做出决策。这个政策制定的“内输入”过程,与之后工程招标的非公开化也密切相关。

但是,即使这样,中国的政策过程也呈现出弹性的另一面,使得公民仍然有机会在某些环节可以影响政策。这种弹性表现在政府对于政治与政策合法性(legitimacy)的追求。政治合法性是通过民众对政治权威的认同与忠诚实现的,而合法性基础也随着政权经历的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政治合法性首先建立在意识形态以及领袖魅力上,这种合法性的根基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便开始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强执政的认同和合法性。随着经济发展,中国GDP总量不断提升,人们生活水平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获得政治合法性的一大

来源。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贫富悬殊、城乡对立、上学难、看病贵等,政府在民生方面投入不足,直接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原有的发展战略使得政府进入“政绩困局”(亨廷顿,1998:59),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和认可度的降低影响了政治合法性。

近年来,中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民生建设上去,而有学者也提出了“民生政治”的概念。民生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不触及政治体制和政权的更替,它是以“改善民生为目标,以民生问题作为政治决策、政治职能和资源配置的重点,用民众生活质量指数和满意指数取代简单的经济发展指数作为考量政治发展的标杆”(曹文宏,2007:78)。民生型政府必须达到“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社会公正”等要求,制定符合“公意”(卢梭,2005:35)的民生政策,才能使民生建设成为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

大卫·边沁(David Beetham, 1991:11)认为在一个权力关系里面,一个政权是否合法不是因为人民相不相信它是合法的,而是在于这个政权是否能够符合人们的信念。进一步来说,就是在于政权与人民价值观之间的吻合度。合法性可以随着政权的更替或者新的选择的出现而“腐化、被挑战或变得不完整”,因为这时候权力的系统以及支撑其合法性的“信念、价值与期望”之间可能不吻合。对民生问题的重视无疑是符合普通人们的价值观,但是解决哪些民生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对于民生建设能否成为合法性来源同样重要。

政策如何被认为体现民意,从而成为合法性的来源主要取决于三方面:一是被放上日程的问题是否是人们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三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期待。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在整个政策制定的周期中,有两个关键点可以反映出上述的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是如何被提上议程的。如果它里面有公众参与的因素,而不只是所谓“精英的洞见”,那么它反映的就可能是普通公民的实际问题。另外一个关键点是解决的方案如何被确定。理想的状态是在各个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权衡的情况下寻求一个平衡点。但在现实世界,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创造各种各样的渠道与形式与尽量多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与咨询。

基于政府对合法性的追求以及“民生建设”逐渐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中国政策制定的过程被打开了一扇“窗口”,而公益行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了影响政策的可能,形成中心与边缘的双向互动(马长山,2012:29)。

二、公益行动的特征

那么,这类公民参与的公益行动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以至能否推动政策的改变?本文将从邓飞团队“免费午餐”事件与“拇指妹”促使“光亮工程”公开可行性报告这两个案例来回答以上问题。

(一) 两个案例

1. 邓飞团队“免费午餐”事件

事情源于2011年2月26日邓飞参加的一次会议。那天邓飞以“天涯社区2010年度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天涯社区的年会。他的邻座、一个叫小玉的支教女老师告诉他,她的学生都没有午餐,她端着饭盒,却无法面对他们热望的眼神,而不得不快步走进自己宿舍吃饭。于是邓飞决定去她的学校一看,发现情况确实如女老师所描述。次日,邓飞在微博呼吁实现乡村贫困儿童的免费午餐。

“免费午餐”计划的发展速度相当惊人。3月24日,邓飞发出了一条微博称“25日将去贵州一悬崖下的乡村小区,当地学生无午餐,每天中午喝凉水充饥。我们尝试在该校建一个食堂,推动中国贫困山区的免费午餐计划。”这条微博得到了多位媒体朋友的响应。4月2日,黔西县沙坝小学免费午餐启动,成为全国第一所享受免费午餐的学校。同时,为了募集到更多的资金,邓飞团队在淘宝上开始销售有形与无形的产品,这让他短短的几个月内,筹集到人民币2400多万元的款项。此外,为了加强其项目的透明度以及公信力,邓飞团队首先要求每个学校通过开设微博公开他每天的开支,确保透明。同时,在深圳的一个厂家给他们提供智能手机后,要求每个学校用这个手机拍摄照片或者视频,证明孩子每天在吃他公开的那些食物。

免费午餐计划迅速扩展到十几个省。出人意料的是,邓飞的免费午餐计划促使政府长期议而不决的营养计划开始有了相关的决策出台。7月19

日,国家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启动民族县、贫困县农村免费午餐试点工作,并将宁夏确定为首批试点省区。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普及680个县市、惠及约2600万在校学生。

2. “拇指妹”促“光亮工程”公开可行性报告

2011年4月21日,广州市建委宣布,广州拟投入1.5亿元人民币升级改造海心沙周边和白鹅潭地区光亮工程,该工程每小时消耗的电费大约5万元人民币,附近各住宅小区光亮工程的全部电费都由市政府买单。消息一出,立刻引来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声。4月27日,广州市民彭燕辉发表题为《征集广州市民剪光头照亮广州,拦下1.5亿光亮工程》的博文,引发网友响应,同时也引起了区佳阳的注意。她有朋友开玩笑说其实可以去申请要求公开可行性报告,应该搞点活动引起关注,没想到区佳阳真的付诸行动。

5月9日,她开通博客,发表博文《大学生致信广州建委申请公开光亮工程可行性报告》;5月16日,她在微博开设“征集大拇指撑广州建委”账户,希望征集1000个大拇指的照片,“鼓励”广州市建委公开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从此获得了“拇指妹”的美称。5月17日,区佳阳根据相关规定,到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五楼的市建委窗口,申请公开广州计划用1.5亿元人民币办光亮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5月26日,市建委称其不是可行性报告的审批管理部门,建议向发改委咨询;5月31日,区佳阳向发改委提出申请,想不到在6月9日发改委又以可行性报告尚未进入审批阶段为由,把皮球再次踢向市建委。对于这种踢皮球的行为,区佳阳向发改委送上了一个带刺的皮球,感谢其回复。7月5日,在预约好的情况下,区佳阳再一次出现在建委,工作人员表示书面答复“将会在工作日期限内给出”。7月7日,事情有了转机,广州市建委主任侯永铨约见了区佳阳,并为她详细解析了1.5亿元人民币光亮工程的有关事宜。

在此过程中,“光亮工程”一度暂停招标。而2011年12月重新招标后,工程费用从1.5亿元削减到2700万元。但是可行性报告却迟迟没有公开。“拇指妹”在网上再次呼吁报告的公开。2012年1月4日,市建委终于约见“拇指妹”,并把可行性报告给其阅读,但是70多页的报告只能够在市建委办